

## 江小涓：建国以来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回顾

作者：江小涓 发布时间：2004-11-17 8:30:04

### 一.概述

建国以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应该包括建国后前30年在“再生产理论”范畴内的相关研究、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在“经济结构”范畴内的相关研究和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产业结构”范畴内的相关研究。据我对有关文献很不完全的浏览，迄今为止，国内专门论述这个主题的专著（不含教科书和译著）有50本以上，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达千篇以上。此外，在八十年代初中期，约有20多本述评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文集中，有专章评论经济学界对再生产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的理论研究。 [1]

改革开放之前，国内没有专门的学科研究产业组织问题。与产业组织相关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以及专业化生产与协作问题，相关问题的专著和论文也较少。我国产业组织的理论研究是80年代中期以来才逐步发展的，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以产业组织为主题或主题之一的专著（不含教科书和译著）约有20本，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也达400篇以上。 [2]

建国以来，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其讲话和文章中阐述过与产业结构有关的问题，中央许多重要文献对产业结构问题也有过讨论。与产业组织有关的阐述和讨论在改革开放前较少，改革开放以后重视程度明显增加。这些阐述和讨论不仅对我国经济建设实践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经济学界理论研究的方向、框架、内容和方法都有重要影响。此外，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中有几次大的反复，每次都与结构的失衡有直接关系，引起经济理论界对产业结构问题几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在回顾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理论发展脉络，不能离开这些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实践背景。 70年代末期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的争鸣，但基本研究框架受到苏联范式的限定，集中于对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讨论；在产业组织领域，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是重点讨论的问题。80年代初期，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证分析成为产业结构研究的重点，但仍然主要在两大部类或农、轻、重关系的框架内进行；产业组织研究的重点也是现实问题，重点转为大、中、小企业的关系研究。80年代中期前后，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被介绍进我国，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范式向多样化变化，一些学者开始尝试采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框架，产业结构问题和产业组织问题被置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周期、市场结构、经济体制等大背景下进行分析，研究方法从逻辑推理为主转向更多地使用经验实证方法，从定量分析为主转向定量与定性研究并重。 下面对建国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分四个阶段简述如下。

### 二.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研究概况

#### （一）经济建设与政治背景

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电力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中之重是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额的85%。

从1958年开始，由于对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缺乏认识和对自身能力的过高估计，“大跃进”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对一些重要产品如钢产量、煤产量等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增长指标，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畸形、劣质高速增长，国民经济及工业内部主要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日益恶化。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国民经济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出在国民经济中，要优先安排农业的发展，在工业方面，要优先安排轻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在重工业内部，要加强采掘工业的生产。经过1963-1965三年调整之后，国民经济失调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工业与农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和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趋于协调。 这个时期我国产业组织的变化轨迹可以从反复出现的中央集权（条条）和地方分权（块块）的循环中寻找。建国初期，我国采用苏联模式，建立起以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208个援建项目为骨干的大型企业群，主要新兴工业部门建成了以少数技术起点高、规模大、直属中央管理部门的企业为骨干的组织结构。此后这种“条条”为主的管理模式的弊端开始显露，从1957年开始了第一次“放权”（将一批企业由中央管理改为地方管理），由于企业与地方的各种关系理不顺，“一放就乱”，60年代初期又开始“收权”（将放给地方管理的企业收回中央管理）。70年代初期又开始放权，不仅中央所属企业大量下放，而且三线建设中形成一大批新建地方企业，70年代初中期各地还建设了一批“五小”企业，即小钢铁、小化肥、小机械、小煤炭、小水泥。到1975年，五小工业的产量已经占全国钢产量的6.8%、原煤产量的37%、水泥产量的58%和化肥产量的69%。此时中国产业组织的二元结构已经十分明显和稳定。

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党和国家领导层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弊端和我国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有所察觉。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即《论十大关系》，提出借鉴苏联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处理好十个重要关系，其中第一条就是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加快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事情，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地方一点机动权都没有。 [3] 陈云于1957年提出，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一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关系，二是煤电、运输等先行工业部门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三是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关系。 [4] 但是，这些指导思想并没有能够较长时间体现在具体工作方针上，结构失衡、增长速度大起大落成为这个时期的常态。

#### （二）理论研究概况

建国以后到7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理论界没有使用“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这个概念,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归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中,有关产业组织的研究较少,比较靠近的研究领域是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问题的研究。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刚刚起步,主要靠引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整个五十年代,国内经济学界对再生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译介、编著和阐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研究,集中于两大部类关系研究的研究,重点是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研究,国内学者基本上处于学习、理解阶段,基本上没有争论。据我查阅资料,最早从苏联译介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著作,是诺特金著、健文翻译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概论》,由中华书局1952年出版,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几本苏联教材的译著。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怀仁的《社会主义再生产》,这大概是较早由国内学者编著的再生产理论著作。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关系和生产资料优先发展规律的要点可述如下。按价值形态划分,社会总产品由三部分组成:不变资本价值

(C),可变资本价值(V)和剩余价值(M)。按实物形态划分,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社会生产相应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称为第I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称为第II部类。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第I部类1年内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必须多于两大部类1年内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以便第2年有多余的生产资料用于扩大再生产,可用公式表达为 $I(C+V+M) > I(C) + II(C)$ ,也可简化表达为 $I(V+M) > II(C)$ 。这个公式在苏联政治经济学中,被表述为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这是我国建国以来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主要理论依据。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较为集中地讨论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重点是对马克思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的理解和阐述。由于我国有了五十年代经济建设的实践和经验教训,特别是“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也由于毛泽东、陈云等领导人“对农、轻、重比例关系有过与苏联教条不同的论述,开拓了学术讨论的空间,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领域的学术研究气氛活跃。虽然所有的讨论仍然在苏联范式下进行,即在两大部类关系的框架下分析问题和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基本规律,但观点的分歧仍然较大,与产业结构直接相关、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5]

1.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过著名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的争论。有学者提出,除了 $I(V+M) > II(C)$ 这个首要的基本公式外,还必须有 $II(C+M) > I(V)$ 这个基本公式(这里表示M中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部分)。因为扩大再生产一方面需要追加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需要追加的消费资料,而且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得到提高。[6]持这种观点学者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马克思的如下一段论述:“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部分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要超过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数量,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这些学者认为,这段话明确指出了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就必须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外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只有一个,就是 $I(V+M) > II(C)$ , $II(C+M) > I(V)$ 只是一个约束条件,基本公式加上它在两个侧面展开的另两个条件式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公式,说明了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不需要再另立什么其它的“基本公式”。[7]

2.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1)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有学者认为,如果 $I(V+M) > II(C)$ 成立,就决定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8]另一种意见是, $I(V+M) > II(C)$ 只是扩大再生产得以进行的条件,而不是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条件是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速度快于消费资料的生产。[9]2)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多数观点都认为,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在扩大再生产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需要强调消费资料生产在扩大再生产中的制约作用。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只提出消费资料生产起制约作用是不足的,应该把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作用概括为基础作用,因为消费资料生产对整个社会生产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10]3)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学者们提出的条件有:重工业生产能力的实际水平,农、轻、重之间相互需求的适应程度,全社会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第二部类能够提供的与第一部类相交换的产品数量,等等。[11]4)两大部类比例和农、轻、重比例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农、轻、重的相互关系,反映了两大部类的相互关系,[12]另一种观点认为,农轻重的关系可以是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只是两大部类内部的关系,因此农轻重的关系要比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不应在这两种比例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13]

这次讨论是建国以后经济理论界关于产业结构问题比较集中的一次讨论。此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停止。由于两大部类关系问题是建国以来极少数与“姓社姓资”问题距离较远的经济问题之一,研究方法也相对“数量化”,因此即使在建国之后到70年代末期之前这段时间内,不同的观点能够被理论界、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决策层所容纳。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研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一件事,是我国于1974年到1976年间编制了一个实物型投入产出表。这个投入产出表包括1973年61种主要产品,以产值计算,覆盖了约85%的农产品、30%的轻工业产品、60%的重工业产品、43%的建筑业和66%的货运周转量。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了主要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和间接消耗系数,由此可以比较准确地量化分析产业构成和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利用投入产出分析研究产业结构问题,大概是当时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中极少数使用相同方法的研究领域之一,西方各发达国家、日本和苏联及东欧主要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使用这个方法。到70年代末期,大约已经有90多个国家编制了投入产出表。[14]

建国后较长时期内,产业组织没能够象再生产理论那样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或理论分支,这可能与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所研究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经济绩效等问题,在计划经济框架中并不存在有关。不过,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仍然会碰到与产业组织领域有关的问题需要研究,例如我国企业规模和大、中、小企业结构就有显著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在同期的理论研究中反映较少,可能与缺乏必要的理论背景和学术传统有关。这个时期比较靠近产业组织的研究是对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问题的研究,理论框架的提出和基本研究思路,仍然主要引自苏联经济理论。据我查阅资料,这个领域中我国最早译介的专著,是苏联学者别里的《苏联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国内学者较早的专著,是季明著的《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专业化与协作》。[15]这些论著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专业化与协作的概念、两种制度下专业化与协作的不同之处、社会主义生产中再生产与协作的特点等问题。在60年代初中期,一些学者针对中国当时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虽然我国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进行,学者们使用一些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概念和术语,

但对某些最核心问题的理解仍有相似之处。例如学者们强调专业化能使用专用设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虽然没有使用“规模经济”一词,但基本思路是相通的。[16] 不过,在研究与协作有关的问题时,强调的是计划经济特点,即要通过计划而不是市场,使协作顺利进行,企业之间是相互支援、相互促进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17]

### 三. 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概况

#### (一) 经济建设与政治背景

70年代末期,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产品、消费类工业品严重供应不足,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严重滞后。1979年,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济建设中执行加强农业和轻工业、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大力发展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政策。经过3年左右的努力,到1981年,农产品和消费类工业品的供应状况显著改善,而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以及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问题没有明显改观。

70年末期到80年代初期,中央有关经济工作的重要文献,都将产业结构(按当时的提法,被归于经济结构中)的调整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要坚决采取有力措施,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支持轻纺工业发展的“六个优先”政策,即在投资、原材料、能源供应、运输能力的安排、进口设备和原材料、外汇供应、包装材料供应等方面,优先照顾轻纺工业的需要。同时,要重视能源、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能力的发展。这个指导方针体现在其后几年的计划安排中。这个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成效显著。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著名文章,推动了理论界的思想解放,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再次强调要解放思想。紧接其后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于经济工作,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战略方针,批评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要求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启动了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改革和开放过程。虽然这些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和文献并没有直接涉及到经济理论研究特别是产业结构研究,但不会不对包括,政治上的争论也不会不对学术争论产生影响。(二) 理论研究概况

这个时期经济理论界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有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沿续以往的学术传统,继续进行马克思两大部类理论的讨论;另一条主线是研究中国现实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问题,此后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一直表现出紧密结合中国现实问题的风格,然而在80年代初中期,由于在传统学术框架之外缺乏其它理论准备,对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分析具有明显的“就事论事”、缺乏分析框架的特点。此外,国外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开始介绍进我国,对国内学者的思路和方法产生影响。1. 对马克思两大部类理论的再讨论

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中期,经济学界结合总结建国以来30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又一次集中开展了对产业结构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开始时,仍然沿续以往的学术传统,即将产业结构问题放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关系的框架下讨论,集中于对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问题的讨论。1979年6月,欧阳胜在《经济研究》上撰文,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列宁关于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要快,并没有改变马克思再生产的基本原理,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业的首要任务。[18] 1979年12月,冯宝兴等人在《红旗》上撰文讨论我国产业结构问题,标题就是《记取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历史教训》,认为我国的重工业是自我服务型的重工业,不能为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服务。[19] 此后经济理论界对两大部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这次讨论与60年代初期的讨论有很大不同,前一次讨论中,绝大多数学者是在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个规律的前提下,讨论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而在这次讨论中,学者们已经开始争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不是一个客观规律以及马克思是否提出过这个规律的问题。有不少观点否认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客观规律,认为这个规律是建立在一些不够科学的假设和计算方法上的,因此其结论也不科学、不可靠。[20] 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坚持认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客观规律。[21] 有些学者提出这个规律并不是马克思提出的,而是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首先提出的, [22] 另外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马克思明确提出过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问题。[23] 这个时期的讨论还涉及到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评价,有些观点认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因此社会主义工业化应该从轻工业开始, [24] 也有观点认为虽然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规律,但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定要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开始,因为“开始”和“优先”不是同一概念,还有学者强调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还是轻工业开始,要由当时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来决定。[25]

#### 2. 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

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进行了一项颇具规模、很有影响的产业结构研究,1979年,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经济结构调查研究工作,组织了400余名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和200余名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按部门组织成调查组,同时集中100余人组成经济结构综合调研直属队,分别到十几个省市,对若干重大结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工作持续了十个月。在这次调研的基础上,有40余名国内著名学者分别就各自调研的专题撰写了分析报告,由马洪和孙尚清作为主编结集出版,对当时及其后较长时间的经济结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26] 这本书的鲜明特点是对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历史沿革进行实证研究,对存在的问题、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政策建议都进行了讨论。这本书中有关产业结构的部分,主要涉及农轻重结构、各主要部门内部结构,就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问题。这部著作及此后几年我国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虽然继续使用“两大部类”或“农、轻、重”的分析框架,但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纯理论的讨论较少。以这本专著为代表的80年代初中期对我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27]

第一、着重总结解放后前30年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业结构明显不合理,成为经济持续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个时期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大都对结构不合理的表现、成因和影响进行反思和总结。许多研究者指出,不合理结构的表现主要有农轻重比例失调、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运输和流通业与生产发展不相适应、小企业盲目发展和“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组织结构等等。不合理结构形成的原因有片面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过分追求高速度、“条块”体制的多次变化等等。结构不合理的后果包括阻碍社会再生产的进行、导致经济效果下降和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第二、强调不能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这部书中的多篇研究报告都以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为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特别是关于两大部类关系的论述。这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结构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两大部类关系不协调,认为处理好两大部类的关系是顺利实现社会再生产的首要条件。我国以往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片面理解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马克思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并不认为生产资料必然优先增长,列宁把技术进步

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引入马克思的公式，才得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结论。而根据列宁的观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也是有条件的，扩大再生产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过去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看成是无条件的，因此认为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无条件的，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妥当的。3·对企业组织结构的研究

这个时期关于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是颇具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特色的领域。由于苏联的生产结构是高度集中的，大企业占绝对的垄断地位，因此关于规模经济、组建托拉斯等问题，是苏联等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较多研究的问题，而诸如中小企业的发展、大、中、小企业的结构等问题，苏联经济学界关注较少，然而，这些问题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比较突出。这个时期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的规模与大、中、小企业结构方面。在马洪、孙尚清主编的这部书中，陈胜昌和李悦比较全面的分析了我国当时的企业规模结构，他们认为我国在企业规模和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型企业劳动生产率低和经济效果差、中小企业的发展不适应当地的资源条件、各种规模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搞“大而全”、“小而全”，等等。稍后时期的学者在研究企业规模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时，比较重视规模经济问题，认为研究企业组织结构要以规模经济理论为指导，强调大企业、经济联合、专业化分工等问题对优化企业规模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重要性。[28]

#### 4. 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在这个时期，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专著或文选，其中与产业结构研究有关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组织翻译出版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翻译出版的《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向》。由于当时仍然认为西方经济理论是“庸俗”的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这些译著基本上是资料性的，并不能代表产业结构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文献和最前尚的成果，主要介绍国外结构现状，涉及到一些理论观点。即使如此，但对于封闭已久、只熟悉苏联研究范式的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却真实感受到了结构问题研究在框架和方法上的多样性。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得到开拓。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有一些学者尝试将一些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引入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中，主要是对西方产业经济学中某些方法、观点的介绍和引用，例如对服务业概念和新的产业分类方法的引入，虽然这些介绍和引用比较浮浅零散，没有成体系，但对于封闭、禁固了30年的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具有解放思想、引入新范式、新方法的重要意义。

#### 5. 产业结构分类方法的变化

这个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比较重要的突破，是在借鉴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新的产业结构分类。我国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长期使用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分类法和农、轻、重分类法，80年代初期，我国学术界开始讨论采用新分类方法的问题。较早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认为，除两大部类之外，还应该加上服务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较快发展是规律，不能认为服务业部门不创造价值，两大部类分类法将服务业部门排除在生产部门之外、排除在产业结构研究之外、排除在国民收入范畴之外是不合适的，西方三次产业分类法可以为我国所用，这样也便于国际交流和进行国际比较研究。[29] 另一些学者认为，第三产业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作为基础，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采用。[30] 或是认为三次产业的划分没有严格的科学标准，各国分类的口径并不一致，把两大部类同“第三产业”加在一起，是风马牛不相及。[31] 总之，关于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是否应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的讨论，在80年代初期是产业经济研究中集中讨论的重点问题，不同观点争论激烈。[32]

总体上看，在这个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重点从理论演绎转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证分析，特别注重对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问题的反思和批判。研究框架仍以传统理论和方法为主，即仍然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产业发展优先顺序这些框架内进行讨论。但经济理论界也深切感到，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继续主要使用传统方法研究产业结构问题，其客观性和解释力都受到限制，不能全面表达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状况和发展趋势，因而开始对传统理论和方法的缺陷进行反思。与此同时，西方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和思路开始被我国学者所关注和引用。四·8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概况

##### (一) 经济建设与政治背景

经过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的结构调整，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的结构问题到80年代中期已有很大改观。首先，以往长期发展滞后的农业和轻工业得到长足发展，1985年与1978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从27.8%上升到34.3%，在农业总产值中，林牧副渔业所占的比重从33.2%上升到50.2%，长期存在的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业和工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有很大改观。在工业内部，消费类工业品的供应增长很快，工业产值中轻工业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43.1%上升到1985年的46.7%。消费类工业品不仅扭转了长期短缺问题，而且开始出现部分品种供过于求的问题。能源、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品短缺问题虽然没有彻底改善，但已经有所减弱。服务业在这个时期发展很快，以生活服务为主的服务行业如商业、餐饮业、旅馆业等供给增长很快，以生产服务为主的行业如外贸业、运输业、金融业等也迅速增长。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一些消费品工业已经出现大量库存、企业开工不足等问题，政府已经感到不必再强调消费类工业品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转向加速发展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并开始强调产业结构的升级。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结构调整的重点趋于分散，既要运用先进技术改造和发展我国传统工业，同时注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既要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也要充分重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还是要努力振兴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而在此之前的所有政府重要文件，都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1989年颁布的《国家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更加分散，涉及农业和工业中的所有大类行业，将每一类产业中的子行业和产品分为支持发展、限制发展和禁止发展三类，其涉及面实际上已涵盖全部农业和工业。总之，由于结构问题本身的变化，这个时期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 and 产业结构发展趋势的看法趋于发散，重点不突出。

##### (二) 理论研究概况

###### 1. 研究范式的转变

在这个时期，我国研究结构问题的学者已经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并翻译出版了一些经典文献，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本于1985年出版的专著扼要介绍了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介绍了代表学者和代表文献。在我国研究产业问题的学者中产生较大影响，对研究范式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3]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有关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教科书和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这些文献对我国学者研究产业结构问题提供了以下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1) 将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状况及其变化联系在一起研究。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有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 [34]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 [35] H. 线纳里等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36] 以及霍夫曼和克拉克的主要观点。[37] 这些学者认为, 一定的产业结构状况是同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库兹涅茨提出, 不同的经济总量有不同的经济结构, 经济总量增长依赖于结构变动, 特别依赖于具有高于平均增长率的新兴产业来推动, 总量增长又必然引起结构变动。克位克提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比例发生变化, 劳动力在第一次产业中的比例下降, 在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中的分布比例上升。库兹涅茨提出, 结构变动不仅限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发生显著变化, 而且部门产值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他不仅一般性地提出上述关系, 而且应用57个国家的历史数据, 用统计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描述了这些国家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结构变动, 使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更加具体。线纳里进一步对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进行研究, 通过对国别数据的处理, 得出一个所谓的“标准结构”, 提出在工业化过程中, 结构变动最显著的时期是人均收入处于100美元到1000美元的时期。这个模式经常被用来识别不同国家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是否偏离“一般规律”。同样有影响的还有罗斯托关于经济起飞阶段主导部门依次更替的理论。罗斯托认为, 一个或几个新的制造业部门的迅速增长是经济转变的核心引擎, 因为这些具有高生产率的主导部门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效应, 在罗斯托看来, 增长就是一系列主导部门的相继而起, 而不仅仅是总量的变动。上述译著不仅分析框架和观点新颖, 而且分析方法也颇具吸引力, 这些研究者采用经验实证方法。通过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其它经济计量模型, 对大量统计资料进行时间系列分析和国家间对比分析。与我国以往主要采取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 这些研究的可观察性和可度量性更强, 有较好的说服力。 (2) 三次产业分类系统介绍进我国

虽然8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对三次产业的概念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就有一些讨论, 但在80年代中期以前, 介绍进我国的有关观点是零散的, 缺乏对国外重要文献的译介, 国内学者也缺少较为系统的研究和论述。80年代中期前后, 对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的译介和研究成为产业结构研究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杨治在《产业经济学导论》中, 在对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观点的阐述中, 较为系统地讨论了三次产业的分类、概念及它们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中的表现。这些时期译介进我国的许多产业结构文献, 都以三次产业分类做为基本的产业分类, 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这些译著使国内学者切实感到三次产业分类法的必要性和分析力, 使80年代初期关于三次产业分类法是否科学、是否适用于分析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的争论没有继续下去, 三次产业分类法自然而然地被我国学者所接受和使用。不过, 由于受到以往传统范式的影响, 在80年代中期前后, 我国学者仍然花较多的精力为这种分类方法的科学性辩解, 还有学者试图将其变成可以在传统范式中理解和讨论的概念。

(3) 将结构变动与政府的干预联系在一起。80年代中期前后, 国外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特别是战后一些后起国家通过产业政策促进结构转换和结构升级的经验, 引起国内学者和决策者的关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有关日本产业结构调整 and 产业政策方面的译著, 包括佐贺利雄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小宫隆太郎等所著的《日本的产业政策》和沃格尔的《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等, [38] 这些论著中的主要观点, 是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 认为由于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相关性, 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 发挥“后发优势”, 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即产业政策, 主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 产业组织理论较为系统地介绍进我国

80年代初期翻译出版的一些西方经济学教材中, 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有专章介绍, 但似乎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较多关注。80年代中期前后, 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式较为集中地引入我国, 在我国经济学界产生较大影响。1985年, 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经济管理讲习班, 编印了《产业组织经济学》讲义, 这大概是国外产业组织理论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进我国。同年出版的杨治的《产业经济学》, 也设有专章介绍产业组织理论, 在国内影响较大。此后更多的专著被译介进我国, 如克拉克森等人的《产业组织: 理论、证据与公共政策》, 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 [39] 对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起到推动作用。

## 2. 理论研究概况

从80年代中期开始, 我国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问题的理论研究, 开始尝试在新的范式中进行, 其特点是以三次产业分类为基础, 从静态理论演绎转向动态实证研究, 将产业结构状况及其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要素禀赋、政府干预等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产业组织的研究尝试采用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框架, 特别重视其中关于规模经济的内容。

### (1) 从经济发展过程把握产业结构变动的脉络

从80年代中期开始, 国内有不少学者从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出发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主要观点有: (1) 强调从目前的发展水平判断, 中国处于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高速增长阶段, 从国际经验看, 在这个阶段, 以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为主要特征, 因此, 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是保证我国今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首要因素, 一些学者还特别强调机械工业高速增长在这个阶段的重要意义。(2) 从工业化的一般规律考虑,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 既要强调产业结构的平衡, 即消除“短线”和“长线”, 也要考虑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按这些学者的解释, 高度化一方面指第一次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 也指各个产业内部技术、资金密集产业比重的增加。 [40] (3) 农村发展问题要放在工业化的大背景下研究。一些学者指出, 中国产业结构中的一个问题是就业结构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 如果仅仅从产值份额看, 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过程, 而从就业份额看, 农业劳动力比例畸高, 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农村经济要发展, 农村产业结构就要从以种植业为主转向多元结构转换, 在第一产业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 第二产业要超前发展, 只有占人口比重80%的农村人口通过上述转变实现了产业结构多元化和达到较高的收入水平, 中国的工业化才算完成。 [41]

### (2) 研究经济发展周期与结构变动的关系

80年代中期以后, 我国有学者将经济周期与结构变动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马建堂在其影响较大的论文和专著中, 既研究经济周期与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关系, 如周期的各个阶段产业结构变动的特征、不同周期类型对产业结构变动形态的影响、不同行业对周期变化的回应等, 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周期波动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 如周期波动中的总量如何以不同的强度传递到不同部门, 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及政府的对策对各个部门扩张与收缩的影响等。这些研究表明, 各个产业对经济周期的敏感度不同, 第二产业的敏感度最高。从周期的原因看, 投资波动是我国周期波动最重要的原因。 [42]

### (3) 开始对第三次产业的系统研究

80年代初期, 我国学者尚在讨论三次产业分类法与两大部类分类法的关系以及在我国应用第三产业这个概念的可行性。到80年代中期

前后,随着我国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和愈来愈多的国外有关文献介绍进我国,经济理论界已普遍认识到使用三次产业分类法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学术界已开始直接了当地讨论第三次产业的发展问题,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第三次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并将三次产业的发展与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的转变结合起来。开始时的讨论使用“服务业”这个概念,研究服务消费品的概念、服务消费品的生产规模与发展趋势等问题。对这类问题较早进行研究的是李江帆,他于1984年和1985年发表的两篇论文,提出了服务消费品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可能性上看,由于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工农业生产上耗费的劳动时间逐渐趋于缩短,使社会总劳动中越来越大的份额有可能投入服务领域,导致服务消费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从必要性上看,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收入水平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多,引起对服务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因此,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不能只考虑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还要考虑物质生产部门与服务消费品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43]

#### (4) 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随着国外经济学界一些著名的产业结构研究文献陆续介绍进我国,国内学者开始将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置于国际经验和工业化一般规律的背景下考虑。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结构变动的轨迹表明,虽然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和模式有独特之处,但从更长远的周期和更本质的特点看,中国结构转换仍然遵循工业化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改革以来,产业结构呈现出向一般规律趋同的变化:产出和就业结构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发生明显变化,产值结构中初级产业份额显著下降,制造业的份额经过八十年的调整后持续上升,服务业的份额继续增加,就业结构以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为主线,发生了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非农化流动。[44]

#### (5) 关于产业优先发展顺序问题

这个时期,一些研究其它国家特别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论著介绍进我国,其中有些国家被认为通过选择“主导产业”、“带头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战后日本和韩国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引起我国学者较多关注。受这些经验的启发,优先发展产业的选择问题成为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包括对“主导产业”、“支柱产业”、“领头产业”等概念。但是,由于所依据的选择标准不同,学者们提出的观点差别明显。有些学者以资源禀赋作为基础约束条件,从我国劳动力充裕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提出我国产业优先发展顺序依次为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基础产业以及为以上产业配套的原材料、原器件、零部件和工业设备,接下来是有潜在能力的下一代出口产业等。[45]另一些学者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现实障碍出发,认为瓶颈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最主要的约束条件,因此应该优先发展基础产业。[46]还有学者依据国外经验和产业间相互关系的理论,认为应从需求结构和产业关联度出发考虑主导产业的选择问题,按这种标准,汽车和建筑业应该成为主导产业。[47]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个时期,我国有一些研究者通过多变量经济模型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从需求的收入弹性、产业关联度、技术进步贡献率、出口潜力、进口替代能力、就业效应、对稀缺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等标准选择优先发展产业。这类研究中提出的优先发展产业有交通运输邮电业、电力工业和电子工业, [48]有机电产业、纺织业和建筑业, [49]还有农业、能源、钢铁、化工原料、交通运输与通讯、关键工业与交通设备制造业、纺织业、电子工业,等等。总体上看,随着更多的因素被考虑进来,学术界关于主导产业的观点趋于分散,包括的行业愈来愈多。[50]

#### (6) 产业政策成为重点研究内容

这个时期译介进我国的国外产业结构研究文献中,有一部分将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与政府的干预联系在一起,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特别是有关日本产业政策问题的研究文献,将日本战后经济的调整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与日本的产业政策联系在一起,引起我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关注。1986年制定的“七五”计划,使用了产业政策这个概念,并给予其重要地位。产业政策的研究成为80年代我国产业经济学界的热点。较早期的研究有周叔莲、杨沐主编的《国外产业政策研究》,对十多个国家实施产业政策的实践给予介绍;杨沐所著的《产业政策研究》,对产业政策在中国发展、改革与开放中的重要作用给予强调。王慧炯、李伯溪、周林主编的《中国产业部门政策研究》和周叔莲等主编的《产业政策问题探索》,对我国若干部门的产业政策进行研究。[51]这些研究对推行产业政策持肯定态度,认为推行产业政策是战后一些后起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应该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7) 以规模经济为主线的产业组织研究 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开始有学者借鉴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中国产业组织问题。大约在1987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提出需要用国外产业组织理论框架研究我国的产业组织问题, [52] 1988年以后,学术界开始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某些部分研究我国产业组织问题,例如用规模经济的观点讨论我国产业组织中企业规模偏小、各种类型企业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不合理的问题、提出应该以大企业为主体再造我国的产业组织。[53]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在应用西方产业组织的基本分析方法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表述我国问题特点的概念和方法。其中胡汝银的专著《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影响较大,虽然这并不是一本典型的产业组织理论专著,但它重点研究垄断与竞争问题,点到了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在介绍西方竞争与垄断理论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竞争与垄断问题的框架,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以国家垄断和行政垄断为特征,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有一些特点如部门内不均竞争,等等。[54] 1990年,陈小洪、金忠义编著了《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应用》一书,这是笔者见到的第一本由国内学者编著的系统介绍产业组织理论的专著,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最基本的分析框架进行介绍。[55]在这个时期,国内也有学者开始尝试将产业组织理论用于具体部门和行业分析,理论的应用有较好的贴切性。[56]

总之,在这个时期,西方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文献、主要观点和分析方法,已经开始广泛被我国经济学界所知晓,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对这些分析框架、方法和观点积极学习和接纳。80年代初期与研究范式有关的许多争论,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停止,使用西方产业经济学分析中国产业结构问题已经成为“时尚”,虽然在这个范式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照搬照套现成框架、不太符合中国特点的问题,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引进生产技术过程一样,必然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因此,这个阶段完成的研究范式转换,对此后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五·90年代的研究概况

#### (一) 经济建设与政治背景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在这次增长中,我国的产业结构状况经历了一次全面变化,出现了若干意义深远的特征,显示出我国产业结构状况及变化动因进入一个新时期。这次变化的主要内容是:到90年代中期,我国各个产业基本上全面结束了“短缺”状况,需求约束从农产品、工业消费品扩展至投资品行业和基础产业乃至部分基础设施。以往多年,无论理论界怎样讨论,政府对产业结构的政策实际上是“短线”指向,即哪些产业供应最紧张,就成为当时重点发展的产业。然而,90年代以来产业结构的

上述变化，特别是“短线”产业的消失，使政府决策层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看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指向不够明确和集中，而且不断变化。表现为进入90年代以来，在政府的重要经济文献中，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不断扩展，已经形成了一组多方向的结构目标。分开来看，这些结构目标都有其合理性，但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已经找不到重点，例如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要加快农业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技术改造、科技开发密切的行业要支持；基础行业的发展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和增长后劲要支持；消费品关系到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支持；还有第三产业要支持等等。这种状况表明，到90年代初中期，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以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普遍短缺的情形下优先发展什么行业，今后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是在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如何优化产业结构。显然，对政府决策者来说，后一种情形的处理要困难得多。难点在于不同性质的问题交织在一起，难以对它们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例如“优化产业结构”的含义是什么？是以技术标准、效率标准还是国际竞争力标准来衡量？再如“优化企业组织结构”的含义是什么？大企业有规模经济方面的潜在优势，但是，追求大规模生产要付出其它方面的代价：企业规模大使建设时筹资困难，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期长，外部配套要求条件高，企业内部管理层次多影响管理效率等；中小企业则具有筹资便利、建设速度快、劳动力成本低、管理效率高等方面的优势，但却得不到规模经济的益处；因此，向什么方向的改进能够优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恐怕没有一般的答案。总之，这个时期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向的看法重点不突出，产业结构目标趋于多元化，（二）理论研究概况

90年代初期以来，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比80年代中后期稍稍“冷”一些。这一变化既可以从主要经济刊物上关于产业结构问题论文数量的相对减少上看出，也可以从相关学术专著数量的相对减少看出。这种变化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经过80年代中后期比较集中地引入西方产业结构研究的经典文献，90年代初中期译介进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几乎没有，国内学术界缺乏新的观点、思路和方法；第二，产业结构问题本身的变化和政府决策层观点的不明确，使学术界失去了直观的现实依据，一些习惯于阐述政府意图的学者也失去方向；第三，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80年代中后期比较集中地引入国外产业结构研究理论文献后，国内许多学者尝试过用西方产业结构的理论框架研究中国产业结构问题，多数研究成果只是套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与中国的情况进行类比，真正分析性的研究不多。但是，要将这种研究深入下去，许多国内学者面临两方面的困难。首先是学术氛围的限制，当时国内学术评价体系比较重视提出新概念、新观点、新思路的对策性研究成果，对那些更深入、更系统、离现实较远的学术研究重视不够，作这类研究往往难以取得经费支持，其成果也难有较大影响。其次是数据限制，由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产业分类及相关统计方法与国外口径很不相同，因此直接应用这些数据进行研究有较多困难，对数据进行调整又费时费力。不过，虽然产业结构研究在整个经济研究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还是有一批重要的研究课题和颇有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简述如下。1.对我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和深入

在这个时期，我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仍然是许多学者的研究重点，比较集中研究的问题有：

（1）改革以来产业结构变动的分析。到90年代初期，已经离改革开放初期的70年代末期过去了10多年，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所需的时间跨度，一些学者开始系统、全面研究改革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例如郭克莎对改革起始到80年代末期的产业结构变化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既分析产出结构的变化，也分析投入结构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联系在一些。[57]

（2）关注中外产业分类及统计数据差别的影响。这个时期我国学者开始注意我国产业分类和统计数据与西方国家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研究产业结构问题的影响，因此在用西方的一些分析框架时，注意对数据口径进行调整。例如郭克莎在其研究中，就对统计数据做了仔细的考察，进行了一些必要调整。江小涓在其研究中，在调整数据的基础上，提出按我国统计口径计算，低估了重工业的比重，并据此对国内当时流行的认为重工业比例偏低、应当较大幅度提高重工业比例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这类在数据调整基础上进行的研究以往较少见到。[58]

（3）产业结构与经济周期的关系。[59]这个时期学者们较多地强调中国结构问题的一个特点：研究周期波动不从结构变动角度进行分析，很难全面、合理地解释周期波动的成因，而研究结构变动若不从周期角度进行分析，则很难揭示结构变动的规律。例如马建堂等人继续他们对产业结构分析方法的研究，并用这些方法对我国产业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60]原毅军用“产业结构失衡度”这个指标，表示产业结构失衡的程度，并用这个指标计算不同时期我国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将之与经济周期的波动相联系，分析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指出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是导致各产业增长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由上升转为下降的一个直接原因。

（4）研究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主要矛盾。随着普遍短缺状况的改变，学者们感到以往“短线”指向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已经不适应，需要有新的思路研究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问题。刘鹤从需求结构转变后产业结构变动滞后的状况出发，认为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供给出现巨大缺口，因此需要加快进口替代特别是设备制造业的进口替代过程，使其成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重要步骤。[61]张立群认为，中国工业化补课（大致上指以往过于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发展滞后问题、因此改革以来强调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在8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应该转向重工业化拉动的工业化阶段，但未能成功转型，因而导致经济增长中的一系列矛盾，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拉动重工业化增长。[62]

（5）继续强调第三次产业的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第三次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成为经济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刘伟、杨云龙在其颇具影响的论文中，从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角度，论述了第三次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在比较了若干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第三次产业发展的状况后，他们认为，虽然第二次产业仍然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主导产业，但由于中国第三次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因此我国第三次产业比重与发展的不适应性，主在不在于其超越经济成长的阶段，而在于落后于经济成长阶段。特别是作为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第三次产业由于其吸纳劳动力方面的特点，在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次产业还是一个产权结构多样化的产业，是一个应市场机制需要而产生的行业，因此，第三次产业的发展对于市场构造，对于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有着直接的作用。[63]一些学者将重点放在研究第三次产业发展较慢的原因，第一，有认识上和理论上的片面性，仅把物质生产部门看作是创造价值的部门，从而只把在这些部门的经济活动看作是“生产劳动”，而为第三次产业中的许多部门看作是“非生产劳动”部门。第二，价格体系不合理，第三次产业中的众多部门长期收费过低，阻碍了第三次产业的发展。第三，社会福利供给制使第三次产业的市场缩小，遏制了第三产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64]

2.尝试用比较符合西方学术规范的方法进行研究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主要经济理论刊物上有关产业结构的论文和与产业结构有关的理论专著，已经很少见到以往那种从两大部类的

基本关系出发,以理论演绎为主研究问题的方法。愈来愈多的学者利用系统的国内外统计资料进行实证分析,也开始有学者以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研究。国家统计局于80年代末期编制了我国1987年投入产出表,为学术界进行产业结构研究提供了方便,这个时期有相当一批研究成果就是利用这个投入产出表进行的。例如杨蕙馨、张圣平利用1987年的投入产出表,对我国产业的关联度进行实证分析。利用产业连锁度和产业推动与带动系数,计算出我国各个产业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李长明利用1987年投入产出表,认为综合考虑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和最终需求生产诱发系数,产业关联度较大的行业有化学工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建筑业和通讯设备制造业,这些行业应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65]刘世锦、江小涓依据国外文献提供的收入水平与“标准结构”的关系,提出我国与其它一些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同等阶段相比,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程度等主要指标都有显著的偏离,并分析了导致这种偏离的主要原因和以后变化的方向。[66]

3.理论背景进一步拓宽。在这个时期,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西方经济理论中不直接与产业结构问题有关、但却对分析我国产业结构颇具启发性的文献,并尝试将之用于分析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例如江小涓尝试用西方公共理论的研究思路,从公共利益的显示与判断、决策者的能力和利益取向、行政系统的效率和运作成本等方面,分析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在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行为等,对我国以往以政府干预为主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思路进行检讨,认为这种思路的一个前提,是认为政府有能力和有愿望对产业结构问题作出大致正确的判决,并且有能力进行有效干预。然而研究表明,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决策层和行政系统,判断结构问题和制定相应政策的能力和动力都不足,改革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实际上更多地是市场机制引导的结果。[67]

#### 4.开始研究衰退产业调整问题

经过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我国多数行业已经基本上改变了短缺状态,进入供大于求的竞争常态,部分行业已经出现明显的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到90年代中期,生产能力明显过剩行业不断增加,相当一部分企业处境困难,甚至有些行业全行业处于无利或亏损的困境。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主要是有关行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中的失误,而是产业结构调整必然表现。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有些行业相对地位下降、面临退出和调整是必然的。[68]针对这种现实问题,经济理论界开始了对衰退产业的研究。周振华和陈准在其有关产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政策的专著中,都以日本的经验为例,结合中国的现实,对结构调整中衰退产业的对策引进行引述和研究。[6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针对衰退产业调整问题的实证研究,例如李农以中国黄麻纺织工业为案例、江小涓以纺织工业和煤炭工业为案例,具体分析了中国结构调整中衰退产业的出现、导致的问题和政策建议。[70]

#### 5.产业组织的研究更加规范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结构---行为---绩效”框架对我国产业组织问题进行较为规范分析的研究成果。王慧炯、陈小洪等人于1991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在较早开始的这类研究中颇有代表性。这部专著采用比较规范的分析框架,使用较为系统和有意义的数据,结合对过程及状态的描述,对中国一些代表性行业中产业组织的演变及现状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观点,例如对若干重要产业集中度的研究、对最小经济规模的研究、对大、中、小企业关系的研究、对纵向和横向一体化的研究等等,都颇有新意。这部专著中的数据、方法和观点,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

[71]稍后马建堂的专著和殷醒民的专著,也使用结构--行为--效益的分析框架,对我国产业组织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这两部专著都比较集中于对规模经济问题的分析,例如分析产业集中度与产出和效益的关系等。[72]到9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开始考虑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一些最基本分析框架分析中国产业组织问题是否贴切这个问题。江小涓和刘世锦对我国家用电器若干行业产业组织演变过程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照搬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某些教条,评判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产业组织结构是不恰当的。例如,在产业高速扩张时期,产业集中度的下降不能表明产业组织结构的恶化,实际上,我国许多行业中排名前几位企业的规模明显扩大,竞争力明显增强,虽然其扩张速度没有跟上行业总规模的超常规高速扩张,使产业集中度下降,但这不能看作是产业组织结构的恶化。[73]

六.若干评论 在建国后前30年的时间内,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这两大分析框架内。从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建设背景看,这两种分析方法都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当时经济建设中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直接相关。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理解简单化,只划分为两大部类关系或农、轻、重的关系,无法分析更具体的产业结构关系;第二,研究方法主要是静态的,没有将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周期变化等相联系;第三,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虽然两大部类理论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分析框架使用了一些数学公式,但只是为了直观表达其含意,为了叙述方便,没有具体的系数或参数,也没有给出可行的区间;第四,事后解释为主,主要是对当时党和国家经济建设方针的解释,前瞻性的研究较少。然而,回顾这段学术历史,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段时间内,经济理论界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中,存在许多争论,截然不同的观点可以长期并存,即使在“反右”后不久的60年代初期,学术界的争论仍然很激烈。虽然学者们不得不使用同样的分析框架,同意一些基本的前提,但想要表达的观点却迥然不同。例如对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后者被含蓄的表达为“在一定时期内更多地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学者们就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其中隐含着对经济建设方针和现实问题的不同看法,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并没有因此受到批评或指责,不同观点的争论基本上限定在学术范围内。我的感受是,建国后前30年,至少在产业结构这个领域,尚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氛围。因此,学术研究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虽然这是限制学术研究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同时也受到学术界知识结构、学术评价体系 and 学者自身思维定式及利益取向的影响。

8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我国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所知晓,并被尝试用于分析中国问题。80年代初中期,传统“两部类”研究方法和西方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方法两种范式并存,各自使用着很不相同的术语分析相同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方法为更多的学者所使用,到90年代初期,已经很少见到用两大部类或农、轻、重方法进行的研究,基本上完成了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对这个转变的原因,我的猜测是,当经济学界将视线投向西方经济学界后,感受到了人们在经济学领域探索的多样性。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研究人员都会有过这样的感受:当可以使用的分析框架被限定时,无论现实问题的变化有多快,超出分析框架形成的现实背景有多远,一切经验材料都必须用这个框架中有限的概念来表达,一切现象都需要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由此使人们感到“理论”的空洞、迂远和无补于事,引起人们对理论界的失望。稍稍转换视角就能发现,在这个世界的其它地方,人们有可能已经用另一种理论,较好地解释和解决了同样的问题。此时,新的思路、观点和分析框架的引入和普遍使用就是必然的。西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这是一些学者所关心和争论的问题。然而另一些学者也会反问,中国的问题是否独特到了这样的程度,需要一个与西方产业结构理论迥异的分析框架?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从静态截面上看,迄今为止的确显



示出与工业化一般模式的较大背离,但从较长周期的动态趋势看,仍然呈现出与国际工业化一般道路趋同的特征:初级产业在总产出和总就业中的份额下降,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带动部门;在高速增长时期,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并显著出竞争优势,到了增长速度平稳甚至相对下降的时期,大企业的竞争力显著增强、规模效益开始明显发挥作用;贸易格局从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为主向附加值和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出口商品转换;城市化过程加速等等。这也是众多工业化国家曾经经历过的画面。因此,在研究我国产业结构问题时,西方产业结构理论的分析框架或许不是最适宜的,但起码是可以有效使用的。实际上,这些产业结构分析框架即使在分析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问题时,也并不见得十分贴切,理论本身也仍然在发展与变化过程中,适宜总是相对的。经过10多年的“引进、吸收、仿制”,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已广泛地被我国经济学界所接受和使用,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是总体上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重复引进”、“重复生产”的状况。那种针对我国情况、能容纳主要事实、合乎逻辑、经得起较长时间检验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还较少见到。当然,经济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也与其它科学领域一样需要时间,需要相关领域的进展例如统计方法的改进、需要必要的学术氛围,需要促进学术水平提高的评价体系以及更多的有利因素。在大量流览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我国很少有学者长期专注于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一个时期中成果相对卓著的学者,不久之后就改变了研究重点,或者从学术研究领域退出。这并不是产业结构研究领域特有的现象,整个经济学界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与我们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有关:在我国目前的阶段,经济学研究中有许多现成的新领域可以开拓,有许多可以开风气之先的机会,有不断变换的新“热点”,但也因之使学者在一个领域的研究难以持续、深入和成就严谨的体系。看来,经济理论研究领域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出现,除其它因素外,还有待于相应学术氛围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形成以及研究领域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江小涓)

主要参考文献:

- 毛泽东(1956):《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编(1981):《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胡晓风 韩淑颖(198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纲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马洪、孙尚清(1981):《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 李悦(1983):《中国工业部门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杨治(1985):《产业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库兹涅茨(中译本1985):《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与生产结构》,商务印书馆。
- 罗斯托(中译本1985):《经济成长的阶段》,商务印书馆。
- 罗斯托(中译本1988):《从起飞到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 H. 线纳里等(中译本1989):《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
- 佐贯利雄(中译本1987):《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
- 小宫隆太郎(中译本1988):《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翻译出版公司。
- K·克拉克森, R. 米勒(中译本1989):《产业组织:理论、证据与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
- 乔治. J. 施蒂格勒(1989):《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三联出版社。
- 劳杰. 克拉克(中译本1990)《工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
- 刘伟、杨云龙(1987):《中国产业经济分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周叔莲等编(1987):《产业政策问题探索》,经济管理出版社;
- 郭克莎(1993):《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 马建堂、贺晓东、杨开忠(1991):《经济结构的理论、应用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江小涓(1993):《我国产业政策推行中的公共选择问题》,经济研究,第6期。
- 周振华(1991):《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陈淮(1991):《日本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王慧炯(主编)、陈小洪(副主编)(1991):《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经济出版社。马建堂(1993):《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殷醒民(1996):《中国工业增长模式的实证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

[1] 主要指研究产业结构一般理论和我国产业结构总体概况的专著和论文,不包括对地区产业结构、特定产业内部结构、产业技术结构等更细分类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浏览范围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图书馆的藏书和我个人的藏书。重要学术刊物包括《经济研究》、《学术月刊》、《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求是》等。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的同志,没有她们在多年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基础上对本项研究的支持,要完成本文是难以想象的。 [2] 主要指研究产业组织一般问题和我国产业组织总体概况的专著和论文,不包括对特定行业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成果。浏览范围同注1。

[3] 毛泽东(1956):《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陈云(1957):《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截《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8年。

- [5] 本部分内容转引自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编（1981）：《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胡晓风 韩淑颖（198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纲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6] 见实学（1961）：《关于扩大再生产公式的初步探讨》，光明日报12月4日。
- [7] 见刘国光（1962）：《论所谓扩大再生产的“第二个基本公式”》，光明日报2月26日。
- [8] 见金学：（1962）：《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讨论及值得探讨的若干问题》，学术月刊第6期；许涤新（1961）：《论社会主义的再生产》，人民日报12月27日。
- [9] 见吴树青（1962）：《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学说及其在社会主义再生产中运用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月8日。
- [10] 见曾启贤（1963）：《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两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
- [11] 见金学（1961）：《一九六二年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学术月刊，第12期。
- [12] 见杨坚白（1961）：《试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关系和消费积累比例之间的内在联系》（上），经济研究，第12期。
- [13] 见吴树青（1962）：《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学说及其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运用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月8日。
- [14] 对这份投入产出表的简介和分析，可以参见陈锡康（1981）：《投入产出分析与产业结构研究》，载于马洪、孙尚清（1981）：《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 [15] 别里（中译本1955）：《苏联工业的专门化和协作》，人民出版社；季明（1959）：《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专业化与协作》，上海人民出版社。
- [16] 例如见李必强等（1964）：《论工业生产专业化、技术进步和经济效果》，经济研究，第2期。
- [17] 例如见乔荣章（1965）：《试论我国工业生产协作的性质和作用》，经济研究，第5期。
- [18] 欧阳胜（1979）《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平衡》，经济研究，第6期。
- [19] 冯宝兴、万欣、张大简（1979）：《记取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历史教训》，红旗，第12期。
- [20] 见鲁济兴（1979）：《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个客观规律吗？》，经济研究，第11期；鲁从明（1980）：《两大部类生产增长速度快慢是不断交替的过程》，经济研究，第5期。
- [21] 见刘恩钊（1980）：《两大部类关系和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经济研究，第3期；马宾（1980）：《技术进步条件下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不能否定》，经济研究，第3期；奚兆永（1980）：《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吗？》，中国经济问题，第2期。[22] 见刘国光（1981）：《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关梦觉（1980）：《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几个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
- [23] 见奚兆永（1980）：《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吗？》，中国经济问题，第2期。
- [24] 见鲁济兴（1979）：《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个客观规律吗？》经济研究，第11期。[25] 见关梦觉（1980）：《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几个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6] 马洪，孙尚清（主编）（1981）：《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 [27] 上述论述主要引自马洪、孙尚清（1981）中的有关章节。80年代初期，李悦也著有一本较有影响的研究我国产业结构的专著，见李悦（1983）：《中国工业部门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8] 见孙尚清（1984）：《论经济结构对策》，第7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9] 较早讨论这个问题的论文见何小峰（1981）：《劳务价值论初探》，经济研究，第4期；陈志标（1981）：《国民收入范畴的重新思考》，经济研究，第4期；朱明耀（1981）：《轻重工业的划分问题》，经济学动态，第3期。
- [30] 孙治方（1981）：《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讨论，——兼论第三产业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以及统计学的性质问题》，经济研究，第8期。
- [31] 刘国光（1981）：《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32] 可以参见于光远（1981）：《首都经济学界继续座谈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经济学动态，第4期。
- [33] 杨治（1985）：《产业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34] 库兹涅茨（中译本1985）：《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与生产结构》，商务印书馆。
- [35] 罗斯托（中译本1985）：《经济成长的阶段》，商务印书馆；罗斯托（中译本1988）：《从起飞到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 [36] H. 线纳里等（中译本1989）：《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
- [37] 霍夫曼和克拉克的主要观点见杨治（1985）：《产业经济学导论》，第二章。
- [38] 埃兹拉·沃格尔（中译本1985）：《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佐贯利雄（中译本1987）：《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小宫隆太郎（中译本1988）：《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翻译出版公司。[39] K·克拉克森，R·米勒（中译本1989）：《产业组织：理论、证据与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乔治·J·施蒂格勒（1989）：《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三联出版社；劳杰·克拉克（中译本1990）《工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
- [40] 例如吴仁洪（1987）：《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变》，经济研究1987年第10期；洪银兴（1988）：《论我国产业结构的平衡态与高度化》，上海经济研究，第2期；刘伟、杨云龙（1987）：《中国产业经济分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温州农村调查组（1986）：《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经济研究，第6期；高佩义（1986）：《我国农村产业革命的发展进程——再论我国农村产业革命》，南开学报，第4期。

- [42] 马建堂（1988）：《周期波动与结构变动》，经济研究，第6期；马建堂（1990）：《试析我国经济周期中产业结构的变动》，中国工业经济研究，第1期；马建堂（1990）：《周期波动与结构变动》，湖南教育出版社。
- [43] 李江帆（1984）：《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李江帆（1985）：《服务消费品的 婺S救(17)骨魔 啤罚 美砺塾别 霉芾志 ?期。
- [44] 例如可参见刘伟、杨云龙（1987）：《中国产业经济分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刘鹤（1990）：《前十年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矛盾》，计划经济研究，第11期。
- [45] 例如可见黄一义（1988）：《论本世纪我国产业优先顺序的选择》，管理世界，第3期。
- [46] 例如可见李泊溪、谢伏瞻、李培育（1988）：《对瓶颈产业发展的分析与对策》，经济研究，第12期。
- [47] 朱争鸣、王忠民、邵崇（1988）：《我国产业结构中的主导产业问题探讨》，管理世界，第1期。
-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1988）：《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问题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期，
- [49] 史清琪等（1988）：《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化研究》，计划经济研究，第2期。
- [50] 谢伏瞻、李培育、仝允桓（1990）：《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管理世界，第4期。
- [51] 周叔莲、杨沐主编（1988）：《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周叔莲等编（1987）：《产业政策问题探索》，经济管理出版社；杨沐（1989）：《产业政策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王慧炯、李伯溪、周林（1989）：《中国部门产业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52] 例如陈小洪（1987）：《市场结构的观念及我国市场结构的若干特点》，南开经济研究季刊，第4期；刘伟、杨云龙（1987）：《中国产业经济分析》中的第二章。
- [53] 例如朱争鸣、王忠民（1988）：《产业组织中的规模经济问题》，中国工业经济研究，第6期；丁敬平（1988）：《以大企业为主体再造我国产业组织结构》，中国工业经济研究，第4期。
- [54] 胡汝银（1988）：《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上海三联出版社。这个时期有一定影响的论文还有：朱争鸣、王忠民（1988）：《产业组织中的规模经济问题》，中国工业经济研究第6期；陈小洪（1989）：《我国产业组织分析及产业组织政策初探》，管理世界，第5期，等。
- [55] 陈小洪、金忠义（1990）：《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应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56] 例如曹金彪的一篇文章就针对我国产业组织中存在的由政府决定“定点企业”“和非定点企业”的“特色”进行研究，见曹金彪（1990）：《定点企业、非定点企业与产业组织变动：电线电缆行业分析》，1990年第4期。
- [57] 郭克莎（1993）：《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 [58] 郭克莎，同注57；江小涓（1995）：《中国工业中长期发展预测及结构变动趋势》，管理世界，第3期。
- [59] 原毅军（1991）：《经济增长周期与产业结构变动研究》，经济研究，第6期。
- [60] 马建堂、贺晓东、杨开忠（1991）：《经济结构的理论、应用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61] 刘鹤（1991）：《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化与出路：需求、生产、就业和贸易的关联分析》，管理世界，第1期。
- [62] 张立群（1992）：《中国产业结构矛盾再认识》，经济研究，第4期。
- [63] 刘伟、杨云龙（1992）：《工业化与市场化：中国第三次产业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经济研究，第12期。
- [64] 辛仁周（1991）：《我国第三产业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管理世界，第3期。
- [65] 杨蕙馨、张圣平（1993）：《中国产业关联的实证分析与产业政策》，管理世界，第5期。
- 李长明（1994）：《产业结构与宏观调控》，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2期。
- [66] 刘世锦、江小涓（1992）：《后来居上：中国工业发展新时期展望》，中信出版社。
- [67] 江小涓（1993）：《我国产业政策推行中的公共选择问题》，经济研究，第6期。
- [68] 江小涓（1995）：《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退出及退出援助政策》，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
- [69] 周振华（1991）：《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陈淮（1991）：《日本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70] 李农（1991）：《试论我国衰退产业和衰退产业政策----以黄麻纺织工业为案例的分析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研究，第5期；江小涓（1995）：《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非体制因素探讨》，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 [71] 王慧炯（主编）、陈小洪（副主编）（1991）：《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经济出版社。
- [72] 马建堂（1993）：《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殷醒民（1996）：《中国工业增长模式的实证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
- [73] 江小涓、刘世锦（1996）：《竞争性行业如何实现生产集中，——对中国电冰箱行业发展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1期。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您是第位访客